

江苏高质量发展:测度评价与推进路径

李子联 王爱民

内容提要 江苏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但近两年出现了提升缓慢的迹象。在“六个高质量”中,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受协调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发达省市,其提升速度较为缓慢;改革开放质量相对较高,但其进一步提升的动力稍显不足,变化趋势较为平稳;城乡建设具有较高的质量,但较上海市等省市为低;文化建设是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其质量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低,与江苏高质量发展靠前的地位极为不符;人民生活质量较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区域竞争优势。推进江苏高质量发展以使其走在全国前列,应在发挥已有优势的同时,不断弥补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中的“短板”。应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新兴产业为依托推进产业协调发展,以居民增收为根本推进需求协调发展。应提升创新能力确保“源头”绿色,严守生态红线确保“过程”绿色,强化生态治理,确保“事后”绿色。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 六个高质量 主成分分析法

李子联,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221116

王爱民,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2111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作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领先作用的江苏,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量上,江苏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49.2亿元急剧上升到了2017年的85900.9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相应年份的6.8%逐步提高到了10.4%;速度上,江苏在1978年—2017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2.4%,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2.8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有效地提高了江苏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对全面小康社会的率先建成以及现代化社会的率先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与全国在高速增长中面临着发展约束一样,江苏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于土地供应紧张、人口增长放缓、能源消耗严重、治污成本内化等制约因素的负面影响,且这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经济绩效及实现机制研究”(CFA160178)阶段性成果。

些影响在国际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摩擦频发以及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形下变得尤为严重。突破这些增长约束以构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长效机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由粗放式的高速增长向集约式的高质发展转变。毫无疑问,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在于,在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挖掘并构建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来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即以江苏为例,通过揭示其现状特征来挖掘发展中的“短板”,以此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就本质而言,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将增长的成果公平且有效地分配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并最终满足人的特定需求,因此经济发展不仅有数量上的要求,还有质量上的标准。由于发展过程中所需满足的人的特定需求,包括诸如人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都可以高效率地完成相应的经济任务、都可以有效地规避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风险、都可以获得结构均衡所带来的可持续增长、都可以享有健康美好的生态环境等基本条件,因此,一种注重质量的经济增长,在增长条件上更加重视权利的平等和人的自由发展,在增长过程中更加重视技术的创新和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增长结果上更加重视群体和谐、经济可持续及道德伦理等(任保平和魏捷,2012)。那么,应当采用什么核心指标来进一步衡量和测度经济发展的质量呢?

已有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选择与构建,如卡马耶夫(1983)将经济增长质量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并以全要素生产率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实际上,单纯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这一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是因为它难以体现要素的配置效率(郑玉歆,2007)。一种反映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应当具有多维性。由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增长数量而言的,因此可以将除经济增长数量以外的所有因素都纳入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范畴。如钞小静和惠康(2009)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内涵概括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任保平(2012)将经济增长质量分为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六个维度(任保平和王蓉,2011;任保平和田丰华,2016);耿焕侠和张小林(2014)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评体系应涵盖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效益度、经济结构的优化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居民经济状况共五大层面。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所构建的多维指标体系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综合质量,因此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

与已有研究中所关注的经济增长质量稍有不同的是,经济发展质量应当涵盖更多影响“发展本身”的因素,不仅应包括增长的效率,还应包括成果的分享;不仅应包括经济因素,还应包括经济之外的其它因素;不仅应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还应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能够逻辑自洽地综合这些因素,并将其有效地纳入到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框架内,则应以“五大发展理念”来作为重要的评价维度。这是因为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追求。以“五大发展理念”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不仅从指标来说具有全面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特征,还能就实践而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引。此外,这一评价体系也能有效地反映江苏在新时代下所提出的“六个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其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对应于“创新”维度下的“增长效率”和“协调”维度下的“产业协调”、“需求协调”和“运行协调”,“高质量的改革开放”对应于“开放”发展理念,“高质量的城乡建设”对应于“协调”维度下的“区域协调”,“高质量的文化建设”对应于“创新”维度下的“研发效率”和“创新潜力”,“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对应于“绿色”发展理念,“高质量的人民生活”对应于“共享”发展理念。因此,就理论渊源而言,江苏的“六个高质量”一脉相承于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之所以暂未以“六个高质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框架,不仅

是因为以五大理念为思想所构建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能够直接有效地反映江苏“六个高质量”的发展现状,也是因为以五大理念为思想所构建的评价体系更便于比较江苏与全国其它省市的发展质量。

二、评价体系与权重测算

本文所构建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一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创新包括研发效率、创新潜力和增长效率3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9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协调包括区域协调、产业协调、需求协调和运行协调4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11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绿色包括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3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9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开放仅包括开放程度1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3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共享包括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2个二级指标及其下设的7个三级指标。综合而言,本研究共涵盖39个细化指标,各类指标及其权重见表1。

表1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江苏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衡量方式	属性
创新 (27.79)	研发效率 (8.45)	创新产出水平(6.50)	专利授权数/R&D人员全时当量	+
		创新投入效率(1.26)	新产品销售收入/R&D经费支出	+
		创新成果转化水平(0.69)	技术市场成交额/GDP	+
	创新潜力 (6.99)	高校教师比例(2.49)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总人口	+
		高校学生比例(3.34)	普通高校招生数/总人口	+
		教育投入比重(1.16)	财政性教育经费/GDP	+
	增长效率 (12.35)	劳动生产率(7.15)	GDP/社会从业人员	+
		资本生产率(0.96)	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
		土地生产率(4.24)	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	+
协调 (20.54)	区域协调 (5.11)	城镇化率(4.50)	城镇人口/总人口	+
		区域协调(0.60)	城市人均GDP最高最低之比	-
	产业协调 (4.44)	一二产业协调(1.17)	一二产业协调度	-
		一三产业协调(1.41)	一三产业协调度	-
	需求协调 (5.91)	服务业比重(1.86)	服务业增加值/GDP	+
		消费率(2.45)	最终消费/GDP	+
	运行协调 (5.07)	投资率(2.82)	资本形成总额/GDP	+
		居民消费比重(0.65)	居民消费总额/社会消费总额	+
绿色 (20.18)	资源消耗 (8.14)	经济波动(3.46)	经济波动率	-
		失业率(0.60)	城镇登记失业率	-
		通货膨胀率(1.0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环境污染 (8.43)	单位产出能耗(4.13)	能源消费总量/GDP	-
		人均用水量(0.05)	用水总量/总人口	-
		人均生活能耗(3.96)	生活能源消费/总人口	-
	环境治理 (3.61)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4.31)	废水排放总量/GDP	-
		单位产出废气排放(3.19)	废气排放总量/GDP	-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0.93)	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GDP	-
开放 (2.82)	开放程度 (2.82)	污染治理水平(1.16)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工业增加值	+
		城市绿化水平(1.10)	城市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
		生态建设水平(1.35)	林业投资/GDP	+
共享 (28.67)	居民收入 (4.03)	外贸依存度(0.39)	进出口总额/GDP	+
		外资依存度(0.37)	利用外商投资总额/GDP	+
		对外投资水平(2.06)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GDP	+
	公共服务 (24.64)	发展共享(0.30)	居民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	+
		城乡共享(3.47)	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	-
		区域共享(0.26)	各省人均GDP/全国人均GDP	+
		教育投入水平(6.55)	教育支出/总人口	+
		医疗卫生投入水平(8.53)	医疗卫生支出/总人口	+
		社会保障投入水平(5.4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人口	+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4.09)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

注:“属性”栏中的“+”表示该指标为正向指标,“-”则表示为负向指标,括号中的内容为百分比权重。

在各类指标中,创新投入效率的衡量指标“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受统计口径的影响,其数据在 2011 年之前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2011 年之后则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土地生产率指标在考虑土地复种的情况下,用农业总产值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表示。一二产业协调度、一三产业协调度两个指标均反映产业协调,其计算公式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之比]-[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之比],如该值大于零,则表明第二(三)产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较强,或者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较多。经济波动率用当年的 GDP 环比增长速度减去样本区间内 GDP 平均增长速度的绝对值来计算。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由于在 2010 年及 2013 年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为保持数据的连续性,用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减去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来近似反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由于在 2007 年以前的统计年鉴中并没有直接提供,因此这一时期的数据用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其它部门的事业费四项相加来进行估算。此外,由于统计年鉴只提供了 2012 年以前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所以 2012 年之后的数据通过公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上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当年农村新建住宅面积/(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增长率)”进行估算而得。

为便于比较并揭示江苏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查找了全国 30 个省市(西藏除外)的相关数据并进行了测算。其中,专利申请授权数、R&D 人员全时当量、R&D 内部经费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总量、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等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级以上城市人均 GDP 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OFDI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告》,其中,2003 年和 2004 年的海南省、2003—2006 年的贵州省的数据缺失,运用当年的 OFDI 存量减去上年的 OFDI 存量估算得出,此外,2016 年的公告中只提供了流量前十名的省份数据和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几大区域流量总额,通过对比,流量前十名中除河南外全是东部地区,所以海南省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出,其它省份通过估算得出,具体方法为:首先计算出 2016 年东北地区 OFDI 的流量增长率,然后分别乘以 2015 年东三省各省的流量,可以得到 2016 的相应数据,依次类推再估算出其它省份的数据。上述数据之外的其它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按地区查找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最早只能追溯到 2003 年,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3—2016 年的省市数据。

对于各类指标权重的计算,首先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避免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量级的指标这一问题的出现。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计算指标权重。之所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是因为在已有的计算方法中:相对指数法未能考虑到各分项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高度相关性(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层次分析法则只能根据研究者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的主观认识进行权重赋值,赋权较为随意;熵值法虽然属于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但却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都是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来确定权重结构,因此可以很好地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但因子分析法无法准确地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刘海英和张纯洪,2006);而主成分分析法却能够获得构成经济发展质量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因此能够较好地分析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影响因素。

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为:

$$\text{正向指标: } X_{ij} = \frac{x_{ij} - \min(x_{1j}, x_{2j}, \dots, x_{nj})}{\max(x_{1j}, x_{2j}, \dots, x_{nj}) - \min(x_{1j}, x_{2j}, \dots, x_{nj})}$$

$$\text{负向指标: } X_{ij} = \frac{\max(x_{1j}, x_{2j}, \dots, x_{nj}) - x_{ij}}{\max(x_{1j}, x_{2j}, \dots, x_{nj}) - \min(x_{1j}, x_{2j}, \dots, x_{nj})}$$

其中, x_{ij} , X_{ij} 分别为标准化处理前后的第 i 个省份的第 j 个指标, n 表示省份个数。

其次用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计算结果显示到第三个主成分时方差累积贡献达到了 89.84%, 所以应选取 3 个主成分。利用旋转矩阵系数、特征根、及 3 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即可计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 为便于观察和分析, 指标权重应进行进一步的标准化处理, 总权重为 100%, 公式如下:

$$W_j = \frac{w_j}{\sum w_j} \times 100\%$$

上式中 w_j 为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 W_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权重, 即最终确定的各指标权重。

运用如上方法进行处理和测算后, 得到如表 1 所示的权重结果: 在反映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因素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赋权值分别为 27.79%、20.54%、20.18%、2.82% 和 28.67%。各大因素所出现的权重差异, 除了与这些因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力度有关外, 还与各大因素所包含的三级指标的多寡紧密相连。从三级指标的权重来看, 对高质量发展影响较大的前五个指标依次是医疗卫生投入水平、劳动生产率、教育投入水平、创新产出水平和社会保障投入水平, 权重分别为 8.53%、7.15%、6.55%、6.50% 和 5.47%, 表明公共医疗覆盖率、劳动生产效率、教育投入、创新产出绩效和社会保障覆盖率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些指标能够较好地解释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各省市中出现的差异; 对高质量发展影响较小的五个指标则依次为人均用水量、区域共享、发展共享、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 权重分别是 0.05%、0.26%、0.30%、0.37% 和 0.39%, 表明水资源消耗、地方相比于国家的收入差距、居民收入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差距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较小。因此, 提升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更应关注并优化公共医疗覆盖率、劳动生产率、教育投入、创新产出绩效和社会保障覆盖率等重要指标。

三、江苏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与评价

1. 纵向比较

以上述指标与权重为依据, 江苏不同年份的高质量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序差异。总体来看, 江苏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 但近两年出现的提升缓慢迹象值得进一步关注。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除个别年份稍有下降之外, 其余大部分年份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值由 2003 年的 37.2 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58.0, 表明江苏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取得了发展质量上的提升, 其在全国的最高排名为第 5 位, 最低则为第 7 位, 平均值位于全国第 5 位, 见表 2。

在评判高质量发展的五个维度中: 第一, 江苏的创新指数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值由 2003 年的 5.5 逐步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15.1, 最高时则在 2012 年达到了 15.6。江苏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也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在其创新指数在全国排位的名次递进中, 2003

表 2 2003—2016 年江苏省发展质量的各类指数及其全国排名

年份	综合指数	全国排名	创新指数	全国排名	协调指数	全国排名	绿色指数	全国排名	开放指数	全国排名	共享指数	全国排名
2003	37.2	7	5.5	9	10.9	16	15.0	6	0.3	6	5.5	5
2004	35.7	7	5.2	7	10.1	16	14.2	5	0.4	5	5.8	5
2005	36.8	7	5.8	7	9.9	25	14.4	5	0.4	5	6.2	5
2006	39.3	6	6.6	7	11.5	15	14.3	9	0.4	5	6.4	5
2007	40.6	5	7.8	6	10.8	14	14.9	4	0.5	5	6.8	5
2008	42.2	5	8.7	6	10.9	13	14.9	7	0.4	4	7.3	5
2009	44.8	5	10.0	5	11.6	20	14.9	8	0.4	4	7.9	5
2010	47.3	5	11.9	5	11.4	12	14.8	11	0.4	6	8.8	5
2011	51.7	5	14.1	4	11.8	7	15.0	13	0.4	5	10.4	6
2012	53.0	5	15.6	2	11.8	23	15.0	15	0.4	5	10.2	6
2013	54.5	5	14.5	5	12.0	14	15.2	19	0.4	6	12.3	6
2014	55.2	5	13.8	5	12.2	15	15.3	21	0.4	7	13.5	8
2015	57.7	6	15.1	5	12.2	13	15.2	21	0.5	7	14.6	10
2016	58.0	6	15.1	6	12.5	14	15.3	20	0.6	6	14.5	12
均值	46.7	5	10.7	5	11.4	16	14.9	12	0.4	6	9.3	6

年江苏创新指数在全国的排位仅为第9位,但之后则开始不断跃进,并于2012年达到了第2位的最好排名,之后则相对稳定地处于全国第5位的较高水平。第二,江苏的协调指数尽管在总体上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但亦存在升降波幅较大的变动特征,其值由2003年的10.9降为2005年的9.9,之后在经历2006—2007年的先上升后下降后,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值由2007年的10.8上升到了2016年的12.5。第三,与协调指数相类似,江苏的绿色指数也出现了反复升降的变化过程。不过,这一指数却并未出现上升的趋势,而是较为平缓地稳定在了14.9的水平上。江苏在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中所表现出的时高时低现象,反映了江苏在这两个维度的关注度上亟需加强。由于侧重点有所偏移,因此数值表现出较大的统计方差和较强的随机性。第四,江苏的开放指数在大部分年份均稳定在0.4的平均水平,最低的为2003年的0.3,最高的则为2016年的0.6,且最近三年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江苏的对外开放水平较高,这与其长期以来实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第五,与开放指数稍有不同,江苏的共享指数除在个别年份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值由2003年的5.5上升到了2016年的14.5,最高的则为2015年的14.6,这一现象表明江苏在富民强省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其共享水平。从开放和共享两个指标在全国的排位来看,江苏的开放水平和共享程度在全国均居于前列,平均排位值为第6位。其中,开放指数的最好排位为2008年和2009年的第4位,最低排位则为2014年和2015年的第7位。

2. 横向比较

从江苏省与其他省市的横向比较来看,综合发展质量优于江苏的省市从前往后依次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浙江省,其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62.9、58.9、51.7和49.8,均高于江苏的46.7,且尤以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的优势为明显,表明与这些省市相比,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见图1。在排名靠后于江苏的省市中,福建与江苏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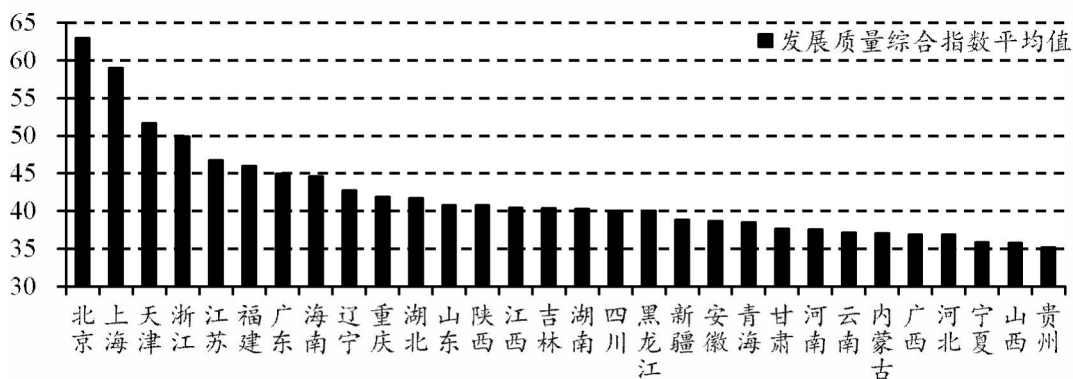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16年江苏与其他省市的高质量发展比较

差较小,且长期处于竞争激烈的胶着态势。综合来看,福建2003—2016年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46.0,仅低于江苏的平均值0.7个单位。在分阶段比较中,2003—2006年江苏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均低于福建,体现在均值中则是江苏只有37.2,而福建则达到了38.3的发展水平;此后在2007—2014年江苏的高质量发展则实现了反超,其均值为48.7,高于福建46.6的平均值。这一数据表明,江苏已开始关注到了发展质量与发达省市之间的差距,因此在围绕富民强省和“两个率先”的发展目标下,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和推进协调发展,最终使得高质量发展优势在2006年后不断凸显。不过,在2015年和2016年,江苏的高质量发展又出现了相对乏力的现象,其综合指数分别为57.7和58.0,均低于福建相应年份的58.5和59.1。

在评判高质量发展的五个维度中:首先,创新指数排名优于江苏的省市从前往后依次为北京市、

上海市、天津市和浙江省,平均值分别为 15.8、13.9、13.3 和 12.1,均高于江苏省的 10.7。不仅如此,以上省市的创新指数及其排名在 2003—2016 年的每个年份均优于江苏省,这一数据比较结果表明尽管江苏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与其它发达省市相比则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出现这一格局的原因,不在于江苏在特定指标上均弱于如上省市,而在于在综合各项指标后出现了总体偏弱的情形。比如:在创新维度的指标体系中,江苏省的专利申请授权数/R&D 人员全时当量指标小于浙江省,但 GDP/社会从业人员却高于浙江省;与上海市相比,江苏省的专利申请授权数/R&D 人员全时当量和 GDP/社会从业人员指标均较高,但技术市场成交额/GDP、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总人口和 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却相对较低。从这一角度来说,进一步提升江苏的区域创新能力并缩小其与其它省市的差距,应综合从研发效率、创新潜力和增长效率三个层面共同发力。

其次,江苏的协调指数在全国最高的排位为 2011 年的第 7 位,最低排位则为 2005 年的第 25 位,大部分年份均处于第 16 位的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现象表明江苏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现状极为不符。与此相类似,江苏的绿色发展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排位最高的为 2007 年的第 4 位,最低的则为 2014 年和 2015 年的第 21 位,平均排名则为全国第 12 位。应当看到,江苏绿色发展出现了与其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此前,江苏绿色发展的平均排名为第 6 位,而此后则滑落至第 17 位,因此 2010 年是江苏绿色发展开始放缓的转折点。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应大力促进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

最后,开放指数平均值高于江苏的省市从高至低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海南省和天津市,对应的指数值分别为 1.1、0.8、0.6、0.5 和 0.5,江苏的开放程度与海南、天津市和广东省相仿,但与上海和北京相比则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共享指数在 2003—2010 年均为全国第 5 位,2011—2013 年则降至第 6 位,此后的三年则逐渐降至第 8、10 和 12 位。因此,尽管在数值上江苏的共享水平出现了不断提升的趋势,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共享发展则呈相对下降的趋势。共享程度优于江苏的省市从高至低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青海,其共享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15.7、15.1、11.1、11.0 和 9.8,均高于江苏 9.3 的平均值。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江苏的共享发展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 发展评价

综合而言,江苏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应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从分类指标来看,江苏的区域创新能力较强,创新发展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优势;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相对较为滞后,促进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是提升江苏发展质量的关键。江苏的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也具有较强的区域竞争力,高质量发展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以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所测算的高质量发展指数为依据,江苏 2011—2016 年“六个高质量发展”的指数及其排名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1—2016 年江苏“六个高质量发展”平均指数及其排名

指标	经济发展质量	改革开放质量	城乡建设质量	文化建设质量	生态环境质量	人民生活质量
指数	15.2	0.5	3.4	8.2	15.2	12.6
排名	8	6	6	3	18	5
优于江苏省市	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上海、北京、海南、广东、天津	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	北京、浙江	海南、北京、福建、甘肃、安徽、江西等	北京、上海、天津、浙江

“六个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受协调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这一质量的提升速度相对于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而言较为缓慢,因此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应加快促进江苏省内的协调发展,见表 3;第二,改革开放质量相对较高,但其进一步提升的动力稍显不足,因而变化较为稳定;第三,城乡建设具有较高的质量,但较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和浙江省为低;第四,文化建设是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其

质量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市和浙江省,因此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应继续发挥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第五,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低,与江苏高质量发展靠前的地位极为不符,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第六,人民生活质量较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区域竞争优势。

四、推进江苏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从测算结果与发展评价来看,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不足在于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进一步推进江苏的高质量发展以使其走在全国的前列,应在发挥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优势的同时,不断弥补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中出现“短板”。结合发展实践,推进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包括:

1. 补协调发展之“短板”,促进江苏高质量发展

首先,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推进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更加注重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更加注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能够解决江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布局、人员居住和城镇环境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而这无疑能够促进包括农村在内的村镇一体与大中小城市的全域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农村区域内部的全面转型以及城镇与农村区域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全面协调。在推进江苏产业城镇化的过程中,以苏南的产业转移与苏北的产业承接来抵消工业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充分发展江苏富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工业化的动力不足,以突显地方特色、适合地区发展的产业战略导向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江苏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减少政府参与土地买卖的行为,进一步完善土地财政方向;加大实用建筑投资,避免城市扩张中的“贵族化”倾向;改革现有制度,协调人口与土地的失衡关系。在推进江苏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深化二元制度改革,创新制度供给;逐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创新户籍制度改革;拓展财政来源渠道,完善土地财政的代偿机制。

其次,以新兴产业为依托,推进产业协调发展。推进江苏产业的协调发展,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壮大是关键。这是因为: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空间大以及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特征。它既能满足大量的就业需求从而通过增收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又能引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从而加快苏北低端产业的升级,更能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融合从而加快促进全省现有产业的优化。因此,发展新兴产业是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是增强江苏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沈坤荣等,2011)。应依托江苏财政实力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资金上重点资助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科技项目;依托江苏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有效的产学研“互助、互通、互利”平台,以合作的形式共同推进理论成果向实体生产的有效转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转化制度,使新技术、新知识和新专利的发现发明者能够得到有效的社会激励;依托江苏产业园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对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诸多产业在内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土地、资金和税收上的优惠。

最后,以居民增收为根本,推进需求协调发展。居民增收是扩大居民消费和增加社会可贷资金的根本,能够在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过程中促进需求的协调发展。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背景下,江苏居民增收的关键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从对苏北农民增收的调研来看,应加大苏北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强对留居农民的知识宣传和技能培训,加快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优化土地利用效率,推广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运作和推广高产高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种植方法以鼓励农业技术创新,稳步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积极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推进土地整理,支持进城务工人员转让土地及宅基地,围绕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的要求,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大幅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鼓励农民进行农产品的深度加工及品牌建设,并予以一定的资金及政策支持,应加大粮食生产、农机购置、牲畜饲养的补贴力度,抓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善生产经营风险救助机制,有效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深入推进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新增股份经济合作社,鼓励集体资源开发和资产营运,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农民集体经济的福利性收入。

2. 补绿色发展之“短板”,促进江苏高质量发展

首先,提升创新能力,确保“源头”绿色。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够有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减少废物排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因此是弥补绿色发展“短板”、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特别应执行好国家规定企业应按销售收入的1%提取研发经费的政策,有条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还应最少保持在销售收入的2%以上,以确保企业自身对研究开发投入的力度。具有强烈的人才意识,全新的人才观念,长远的育才战略,完善的激励机制,尽快形成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机制,建立公平的业绩评估体系,培育数量稳定、素质较高的与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相适宜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把握研发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性投资,应加大对跨国公司研发性投资的吸引力度,以促进和提升江苏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进步,切实提高企业的绿色生产能力。利用好江苏省对外开放度高、民间比较富裕的区域优势,放宽目前过紧的融资和投资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海外资本等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建立起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多渠道的风险投资融资体系,以实现风险投资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目的。

其次,严守生态红线,确保“过程”绿色。从广义上讲,生态红线既可以理解为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又可以理解为是为实现集约生产而具体制定的在低碳、低排和低耗等方面的绿色标准。因此,严守生态红线的功能在于对高排和高耗生产的区域和企业具有特殊的警戒作用,在于在过程中实现绿色生产。应科学划定红线区域和制定绿色标准,至2020年末确保江苏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占全省国土面积的比重高于20%,借鉴国际通用的生态警戒线制定契合江苏具体发展的绿色标准,以在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和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严守生态红线,时时把控生态警戒线,应实行“铁腕”管控,对于低碳、低耗生产具有示范作用的企业给予广泛宣传 and 适当奖励,对于违反标准、未守红线的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则应给予严厉惩罚并追究责任。依托新信息技术和专业监测系统,强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监测监控,定期组织开展评估与考核,及时掌握生态保护红线和绿色标准实施的动态变化。

最后,强化生态治理,确保“事后”绿色。对于未纳入生态保护区域和未达到绿色生产标准的企业,应加大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以确保“事后”的绿色发展。应建立有效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强化统计制度的执行力度,严格按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统计口径、数据来源和时间要求等展开评价工作,并以此为目标和依据对江苏各级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考核,适时将考核结果纳入到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奖惩任免的评价体系中。在全省加快健全优化生态补偿制度,加大省级财政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转移支付制度,并以此为依托将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的范围扩大至红线区域以外的合乎标准的企业,以全方位、大范围地促进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考虑设计累进式的治污费征收制度,即对于污染和耗能指标越劣的企业,应征收集累递增的治污费,以此加大治污费用的征收力度、增加治污经费的支出规模。强化高耗、高排和低效企业的强制性退出机制,做到生态治理无“仁慈”,通过“铁腕”治污的方式促进绿色发展。

3. 扬共享发展之“长处”,促进江苏高质量发展

促进江苏高质量发展,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继续发挥江苏共享发展的优势。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能够从微观层面激发个体把“蛋糕做大”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够从宏观层面分别促进需求和供给对共享发展的拉动和推动作用。就省级层面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而言,在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坚定“壮士断腕”的改革魄力和秉承“统一战线”的改革智慧,以使改革政策能够得到最有力和最广泛的支持和实施,并进而最大程度地激发经济主体的生产潜能。

首先,更加重视机会平等的制度建设和公平分配的机制完善,让省内所有公众都能够不论其地域、身份和职业,更加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享受医疗保障和获取教育培训等活动,真正做到“省内一体化”。进一步破除劳动要素市场残存的垄断壁垒,坚持人才选拔的唯贤理念;进一步取消城乡分割的传统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优化配置;进一步约束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推进阶层社会资本的良性发展。

其次,在继续加大对低收入者特别是最低收入者补助力度的同时,创造对口的就业机会以使这部分人群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更有尊严的生活。特别关注农村居民特别是苏北农村居民的增收问题,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加大支农力度和发展现代农业来更有效地整合和调度农业资源,以使农民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大幅度的增收。各级政府应将所增长的税收更大比例地投入于公共服务支出项目中,特别应加大惠民项目的支出,以使收入分配改革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最后,应施行利益共享式的再分配。着重于促进个人收入的更快增长,促进劳动者报酬即工资的增长,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通过有效的收入增长机制激励劳动者,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生产效率,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实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搭建一切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产业平台,以使其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2. 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北京〕《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3. 耿焕侠、张小林:《基于熵值法的江苏经济增长质量定量分析》,〔石家庄〕《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年第1期。
4. 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0页。
5. 刘海英、张纯洪:《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2006年第2期。
6. 任保平、田丰华:《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及其战略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7. 任保平、王蓉:《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8. 任保平、魏婕:《经济增长质量:一种全新增长命题的理论解释》,〔福州〕《福建论坛》2012年第9期。
9. 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理论阐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上海〕《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
10. 沈坤荣、虞剑文、李子联:《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江苏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1.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用TFP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若干局限》,〔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

〔责任编辑:如 新〕